

25.08

商县文史资料

85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94.126/26

商县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陕西省商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同志在谈到文史资料工作的重大意义时，曾说过：“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他还高瞻远瞩地指出：“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后代。”这里蕴含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

关于征集资料的范围问题。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是以向各界人士征集近现代史资料为主要任务。五届政协以后，由于政协中增加了不少共产党的老同志，因此开展了党领导的革命史料的征集和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鉴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已经成立，中共党史资料由他们征集出版更为适宜。属于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群众运动等史料，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仍可征集出版。

（以上摘自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

文史资料涉及政治、军事、工商、经济、科技、文化、民族、华侨、宗教等方面，范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丰富，鉴于掌握近代史、现代史和革命史资料的同志和朋友大都年高，因此，必须抓紧这项工作，要“抢救”，否则，将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

（摘自一九八零年七月五日“全国政协机关党组讨论文史资料工作的纪要”）

目 录

西安事变时的商县·····	胡宝仁 (1)
知名爱国人士仇少珊先生 ·····	刘子唐 胡宝仁 (10)
商县历史沿革·····	王庆善 (20)
商县紫荆新石器时期遗址·····	雷文汉 (24)
龙山塔小志·····	鱼述华 (31)
民国初期商县的基层政权机构 及田赋概况·····	<u>任重民</u> <u>陈明德</u> (34)
清末以来商县的商会组织概况 ·····	周作人 (47)
商县旧日民间经济互助形式 ——纳钱会及其它·····	屈明伸 (56)

商县南秦川造纸业史略……………王明哲（63）

商县银匠首饰业简史

……………张学瑶 刘庭芳（70）

商县邮政史话……………赵兴善（78）

商县民间传统节日习俗……………李克昌（84）

基督教在陕西商洛地区活动概略

……………高映明（116）

历史罪人——唐靖与古世珍……………杨翰青（154）

大匪霸——周寿娃……………郭志文 杜国兴（184）

“西安事变”时的商县

胡宝仁

一九三六年秋，日寇大肆侵华，绥远告急，华北危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中国共产党通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青年学生中进行的抗日爱国教育，大大地激发了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觉悟和革命热情。当时，陕西省立商县中学不少爱国师生，关心国家前途，无不抱着御侮图存的迫切心情，走出课堂，宣传抗日。就在这时，西安相继传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绥远抗日”等救亡信息以及绥远百灵庙抗日大捷的喜报，校内同学自动组织起来，白天黑夜地上街宣传募捐，大力支援绥远前线。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小雪初霁，朔风送寒，当天，西安至商县的交通电讯突然中断，社会上遂有传说：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逼蒋抗日，实行兵谏。这就是后来举世

闻名的“西安事变”。中午，商县驻防的蒋介石别动总队第一支队公秉藩部惊慌撤离，移驻商南。别动队派到商中监视师生的军事教官也收回了军训枪枝，慌忙溜走。嗣后，商县空城三日，无武装防卫，民心惶恐，市面冷落。

十五日晚，西北军韩世本团来商，协助刘文伯（杨虎城旧部）接收前陕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钟相毓的职责。

十六日，有旅省学生张效良、王天启等协同专署政工人员刘光辉、上官克勤来到商中，号召青年学生要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经多方研究，确定由旅省学生张效良，社会青年武靖国及家居城内的商中高年级学生张映奎、刘庆贤、吕彦儒和我等组成“商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并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秘书、后勤等干事，专员刘文伯兼名誉会长，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均设有委员，会址设国民党县党部，救国会所需活动经费由原县党部经费开支。原国民党商县县党部书记李鹏飞早已逃走。

十七日，救国会召集各机关、学校、人民

团体代表及社会名流，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决定采取多种形式，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深入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会后，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便积极进行准备工作。县立第一小学代校长程景范、教师李实生、税局局长任重民、春芳女子小学校长王用贤诸先生，即联络人员，夜以继日地写宣传文章，印发传单，画救亡漫画，编写救亡歌曲等演唱材料，各机关、学校也都废寝忘食地积极组织排练。之后，于十二月二十日在县城北门外靠西城角搭起彩台彩棚，召开了有城乡农民、商户、公教人员，西北军部队等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大会由刘文伯专员首先报告开会意义，他激愤地清算了蒋介石十年误国的独裁政策，号召全体军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历次抗日救国宣言和张、杨两将军的抗日救国八大主张，团结各党派，停止内战，枪口对外，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继由西北军部队韩世本团长，西安来商代表，商县工、农、商、学、妇等各界代表先后讲话，会场上

欢呼声、口号声响彻云霄，震撼山城，群情激愤，人声鼎沸。大会向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发了电文；会后照相留念。接着，又在城内十字口广场和东西关进行了为时十天的宣传演出，（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大大激发了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就在这一天，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暨中共代表团派人来商县，在专署楼上举办报告会（每晚七时至十时）会场主持人是王寿廷（商县名流，当时负责商县财经委员会工作），报告内容是：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日寇侵华史、东北沦陷后我国同胞被蹂躏的苦难情景，特别讲了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及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得到了国民党爱国人士和各党派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等内容。由于报告人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对日寇的无比仇恨，不断激起听众的愤慨，听众很快由开始时的数十人增加到数百人，以至室内室外，人山人海。报告会持续半月之久，听众深受马

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大局由杨虎城将军主持，继续与蒋介石周旋，而蒋介石背弃了在西安答应抗日“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调动大军云集豫、陕边境，商县、兰田一带，每天都有国民党飞机低飞城头，战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当情势紧急之际，中共中央军委派遣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星夜驰抵商县，群众夹道欢迎，如见亲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红十五军团徐、程首长率部经十字口，在救国会暂时小憩并进行座谈。座谈之后，使救国会的同志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工作任务和奋斗方向，坚定了胜利信心。红军进城后，纪律严明，与群众亲如鱼水，有口皆碑，群众夸奖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红军在商县，多次通过救国会邀请当地士绅及知名人士，探讨抗日救国问题。仇少珊、王用贤两位爱国志士，能以国事为重，推心直腹发表意见，得到红军有关同志的称赞。

红军进驻商县后，反对张、杨两将军八大主张的“讨逆军”在丹凤（龙驹寨）、商南和洛南县的三要一带集结如山，虽数倍于商县城周的抗日军队，但他们却“闻虎色变”，不敢越“雷池”一步。红军镇静如常，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进行形势教育，有力地提高了青年学生们的政治觉悟，市民安居乐业，胜过往昔。

一九三七年元月，在十字口广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和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日大会，会场上，几十条显眼的大幅标语和油印、复制的千百张救亡漫画贴遍四周以及城内外和东西两关；郊区农民、妇女和儿童也都从远道赶来参加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首长程志华向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抗日救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大长了人民志气，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群众兴高采烈，盛况空前。会后，红军政治部文工团演唱了淞沪抗日话剧中的《在淞花江上》、《黄河谣》等文艺节目，广大群众受到了极大启发和教育。当时观众与演

员的情感交融在一起，相对而泣，可见演出的效果是多么的成功。

元月中旬，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长张毅忱和王伯栋同志住救国会具体指导工作。有一天，他俩约我陪同走访了住商的意大利传教神甫白继易表明我们宣传抗日救国是为了收复失地，保护同情我国抗日的外国传教士的合法权益。白回答说：“你们收复你们的失地，我们决不干涉，我们国内也有共产党”。看来，当时的外国传教士对共产党是敬而生畏的。这次走访时，爱国教民何向黎（原天兴春饭馆经理）也在座，何事先受白神甫吩咐已安排了丰富的饭菜，准备款待我们，被我们婉言谢绝了。后又走访了福音堂芮牧师夫妇和杨虎城将军的旧部下张效骞以及古世珍等人，鼓励张、古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二月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驻商红军奉命调动，临走时对商县的抗日救亡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安排。离商前一日，张、王两同志曾对我们说：今后的救亡工作可能被反动派摧残，以后要利用学习或工作的合法身份，隐

蔽下来工作，有事可通过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宋绮云联系转达。

二月上旬，红军、西北军，整队出发，步出商县城关，群众依依相送，恋恋不舍，当地一些青年、学生也一同随军北上，参加了卫国守土的行列，前任商洛地区卫生局长的王奉海和已故的蒋治伦等同志就是这次参加红军奔赴抗日前线的。

三日后，东路、北路蒋军返驻商县，反动派复辟了，尽管口说对这次“附和”事变人员概不追究，但仍对有些人寻隙生非，迫使他们逃避在外，对学校师生则进行秘密监视，直到“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后才放松了。

一场轰轰烈烈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虽告结局，但红军在驻商的一月多时间里，却给我们商县撒下了抗日救国、复兴民族的种子。就在这年，商县中学即建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在校学生刘丹东、王连成、巩得胜、黎涛、江平、郭建都等又先后经王伯栋同志介绍奔赴延安抗日大学和安吴青训班等地学习，投身革命；张效良、刘庆贤到西安后也参加了民

先队工作。商县广大群众、青年学生，受到了一场深刻的宣传教育，正确地认识了国内外形势，明确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坚定了最后胜利的信心，从而在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知名爱国人士仇少珊先生

刘子唐 胡宝仁



仇先生名万龄，字少珊，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于商县城内西背街一个封建家庭，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三月初四晚上遭歹徒暗杀，终年四十岁。他一生热心地方教育事业，热爱祖国，在爱国主义教育和抗日救亡工作上做出了卓越贡献，深为全县广大群众和各界人士所敬仰。

先生原籍山西省闻喜县，于清康熙年间由曾祖父以小手工业（挣罗）来商定居，至其父仇西山，经营商业，商县城内设有“大顺恒”商号，聘王汝霖老先生为家塾教师，教管于女。王老师系前清落第举人，为人忠厚，公正不阿，不满清政府丧权辱国，憎恨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终生誓不仕清。先生从小受王汝霖老师的熏陶，自幼即有救国大志。至弱冠之年，

又先后就读于西安甲种农业学校和中山大学，相继受到一些进步人士的教诲，逐步树立了爱国的思想。

一九二八年秋，仇先生离西安返乡，任商县县立第一小学（即今城关小学）校长职务。到职后，他便以爱国主义为内容，改变了学校教育以往不谈国事的老学府状况，在全体教职员中宣讲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罪行和抗敌救国的要义，并提出要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学生不忘国仇，洗雪国耻。他的主张很快得到学校同仁程景范、周子明、李实生、杜士先、凤彦林、郭唐卿等先生的赞同，遂采取一系列措施，通过课堂、周会、朝会、晚会轮流给学生宣讲，向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深受学生及社会人士称赞。他还改革了学校有关教学的许多制度，树立起新的学风；在环境方面，先改变卫生面貌，又整修“半芥园”，栽花种树，美化环境；在教学内容上，改国文（文言文）课本为国语（白话文）课本；取消了原来的“修身”课，增设了自然课、农业课、党童军课，建立党童军；通过试行，又逐